

台湾选民议题取向的空间模型分析

林 冈 张彬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统“独”议题一直在台湾的政党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近年台湾经济不景气、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政策议题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社会正义与贫富不均更成为国民党和民进党政攻防的焦点之一。那么,社会福利议题和统“独”议题何者更能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本文基于2012年“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数据,运用“空间理论”的“趋近模型”和“空间模型”分别检验统“独”议题和社会福利议题,找出最符合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解释模型。同时,通过台湾选民议题取向的历时性分析,判断议题立场对选民投票行为影响程度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 议题取向; 统“独”议题; 社会福利议题; 空间模型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6.05.001

一、研究缘起

选举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一环。民众可以通过选举来决定政治领袖与民意代表的人选,并以此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政府也将经由选举获得统治合法性。而政治精英们为了赢得选举,常常凸显有利于己的议题,提醒民众予以关注,了解不同政党或政治精英在该议题上的不同立场,依此作出政治判断。正如卡迈恩斯和斯廷森(Carmines and Stimson)在《议题的演化》(Issue Evolution)一书中所揭示的:“谈到政治就是谈到议题。”^①因此,“议题取向”长期以来一直和“政党认同”、“候选人取向”一起被视为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三大变量。^②

在台湾社会中的议题多种多样,有些议题能够持续在每一次选举中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另一些议题却无法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实质影响。有些议题虽然曾经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却最终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改变逐渐褪去它们的影响力;而另一些议题则相反,影响力逐渐增强。20世纪60年代,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台湾社会的蓬勃发展,并就此迎来了威权政体下民主转型的契机,民主改革成为当时台湾的重要政治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民主化后,反对运动所提出的民主改革议题随着解除“戒严令”等民主化措施的采纳而减弱其意义,台湾民众针对两岸未来是走向统一还是“独立”这一议题上立场分歧严重,统“独”议题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在政党竞争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近年随着台湾经济不

收稿日期:2015-12-03

作者简介:林 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张彬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E. G. Carmines, J. A. Stimson, *Issue Evolution: R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

② A. Campbell, G. Gurin, W. E.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e: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1954, p. 1.

景气和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福利与财富分配的议题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社会正义与贫富不均议题更成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主要政见与政策攻防的焦点之一。那么,社会福利议题和统“独”议题何者更能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本文通过“空间模型”,着重分析2012年选举中不同政党在统“独”和社会福利两项议题上的立场对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并观察近年这两项议题影响力的变化趋势,从而把握台湾选民的“议题投票”行为。

二、议题取向的空间模型

空间理论源自于霍特林(Hotelling)对厂商最佳设厂位置的研究,^③对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影响深远。在这种空间概念推演出的许多理论模型中,又以唐斯(Downs)提出的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最为重要。该模型认为选民会投票支持某个政党,是因为相信其能够比其他政党提供给他更多的利益;选民会通过“议题”事先计算各个政党所能带来的利益,并且能够区辨政党之间的差异,进而作出投票选择。另一方面,政党也是由理性自利的个人组成,政党的主要目标是夺得执政权,因此他们追求选票最大化,利用议题来吸引选票。因此唐斯指出“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制定政策去赢得选举”。^④后继者根据这些主张,进行演绎、推论和修正,建立了选民议题取向的空间模型。空间模型主要延续了唐斯的传统“趋近模型”及拉比诺维茨(Rabinowitz)与麦克唐纳伊(Macdonald)的“方向模型”。

1. 趋近模型

由唐斯首倡的“趋近模型”假定选民是理性和自利的,会依据政党提出的议题主张,衡量不同政党可能为其带来的效用,在竞争的政党间排列偏好顺序,从而作出投票选择。那么,选民是如何去衡量效用与排列偏好顺序的呢?在该理论的架构下,每个选民及政党在政策议题的多维空间中有其代表的位置:选民的位置代表他们对政策议题的理想点,表现出他们所拥护的议题立场;而政党或候选人也有其相对的位置,代表他们在这些议题上的政见主张。选民在众多候选人中会选择与其理想点位置最为接近的人选,因为选民认为双方距离越近,他们获得的效用越大。这一理论的数学模型为:

$$U_{ij} = -\sqrt{\sum_{k=1}^n (V_{ik} - C_{jk})^2} = -|V_{ik} - C_{jk}|$$

U_{ij} 表示候选人 j 当选时选民 i 所获得的期望效用;

n 表示议题个数;

V_{ik} 表示选民 i 在第 k 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C_{jk} 表示候选人 j 在第 k 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i=1,2,\dots,n$ 。^⑤

以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例,对于选民A来说,若 $U_{国民党} > U_{民进党}$,即 $U_{国民党} - U_{民进党} > 0$,则选民A会将票投给国民党;反之,若 $U_{国民党} < U_{民进党}$,即 $U_{国民党} - U_{民进党} < 0$,则投给民进党;若 $U_{国民党} = U_{民进党}$,即 $U_{国民党} - U_{民进党} = 0$,选民A则会根据其他因素作出其选择。

③ H. Hotelling,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Economic Journal*, 1929, 39: pp. 46-57.

④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5页。

⑤ S. Merrill III, B. Grofman, *A Unified Theory of Vo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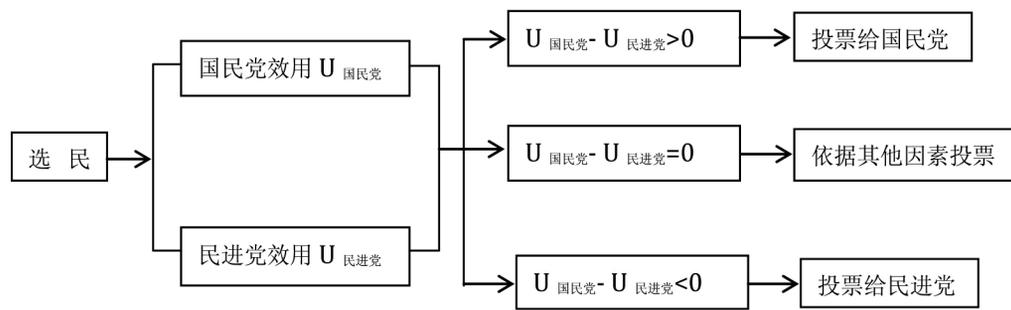


图1 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发生过程

2. 方向模型

传统的趋近理论模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质疑,一些学者提出“方向”(directionality)概念取代“距离”概念,引起学界的广泛探讨,导致空间投票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向模型的倡导者马修斯(Matthews)因循唐斯的理性人假设,但不认为理性的选民会根据其与候选人政策主张距离的远近作为效用评估的标准,而是以政策的方向为考量基础。他们认为选民无法完全辨别自己或候选人在政策选项中的准确位置,多数选民仅能依据候选人相对位置的方向来进行判断。^⑥在此基础上,拉比诺维茨与麦克唐纳伊又增加了一项选民评估候选人的标准,即候选人对该议题的支持程度,也就是所谓的政策强度(intensity),从而产生了同时强调议题立场的“方向”与“强度”的方向模型:

$$U_{ij} = V_{ik} * C_{jk} = \sum^n V_{ik} * C_{jk}$$

U_{ij} 表示候选人 j 当选时选民 i 所获得的期望效用;

n 表示议题个数;

V_{ik} 表示选民 i 在第 k 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C_{jk} 表示候选人 j 在第 k 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i=1,2,\dots,n$ 。^⑦

在“方向模型”中,选民与候选人的议题立场被放在一个量表中,正负符号代表偏好的方向,数值的绝对值代表偏好强度。同时,量表中的0表示该议题的中立点,若选民和政党或候选人的议题立场方向相同,则正负符号相同,相异则相反。而若选民或候选人有一方或双方处于中立点,则该议题对于选民效用的效果为零。只有当二者立场方向相同,且都有强烈偏好时,该候选人当选才能使选民获得最大效用。

3. 趋近模型与方向模型的比较

“趋近模型”和“方向模型”同样遵循理性选择的假设,但是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这两种空间模型对选民行为的不同推论,我们可以通过图2来表示。以台湾不同政党的政策立场为例,根据“趋近模型”的理论假设,选民A会选择议题立场离他最近的政党候选人,所以他的选择偏好顺序将会是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然而,在“方向模型”的逻辑下,由于选民更加关注政党议题立场的方向和强度,选民A会依次选择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

^⑥ S. A. Matthews, “A Simple Direction Model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Public Choice*, 1979, 34: pp. 141—156.

^⑦ G. Rabinowitz, S. E. Macdonald, “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9, 83: pp. 93—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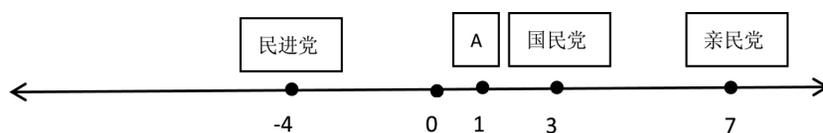


图 2 单一议题政党与选民的立场位置

当存在两个议题时,模型将从一维坐标系升级为二维坐标系,选民和政党的议题立场如图 3 所示。依据“趋近模型”的理论假定,对于选民 A 而言,国民党当选的期望效用为 $\sqrt{(0-4)^2+(3-1)^2}=2\sqrt{5}$;而亲民党当选的期望效用为 $\sqrt{[0-(-2)]^2+(3-2)^2}=\sqrt{5}$;民进党当选对于选民 A 的效用则应该是 $\sqrt{(0-1)^2+[3-(-1)]^2}=\sqrt{17}$ 。因此,选民 A 的选择依次是国民党、民进党和亲民党。而按照“方向模型”,国民党当选的期望效用为 $0*4+3*1=3$;亲民党当选的期望效用为 $0*(-2)+3*2=6$;而民进党当选的期望效用则应该是 $0*1+3*(-1)=-3$ 。则选民 A 的偏好顺序依次是亲民党、国民党和民进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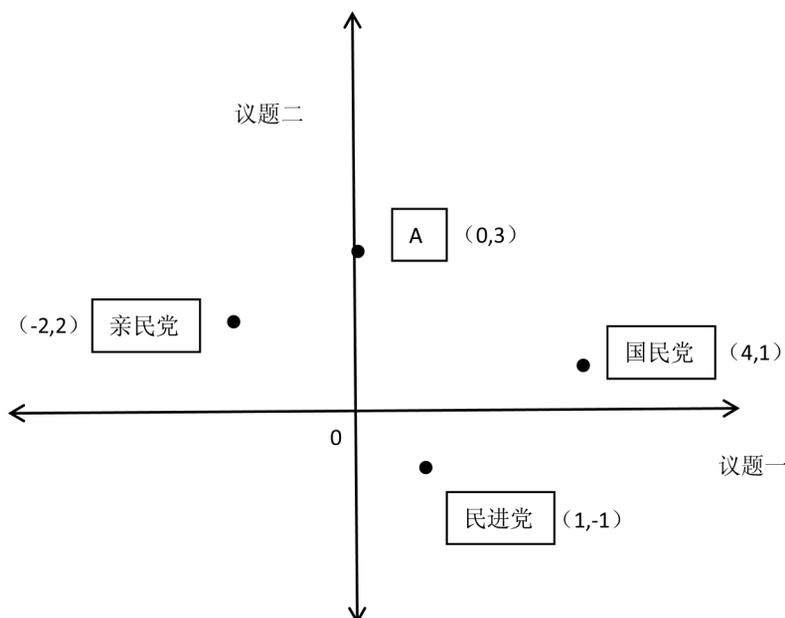


图 3 两个议题政党与选民的立场位置

通过上述说明,我们能够明显看出“趋近模型”和“方向模型”的不同,前者关注选民与候选人之间议题立场的距离远近,而后者关注选民与候选人在议题上的方向和强度。那么,究竟哪种模型对于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议题取向更有解释力呢?本文将在实证检验部分对其进行检验。

三、趋近模型与方向模型的检验与比较

依据“趋近模型”的假定,当选民与政党之间的政策立场距离愈接近,即“空间长度”($-|V_{ik}-C_{jk}|$)的值越大,选民对该政党的效用评价就会愈高;而依据“方向模型”,则是当选民与政党之间的议题立场同方向,且强度愈强,即“空间乘积”($V_{ik} * C_{jk}$)的值愈大,选民对该政党的效用评价就会愈高。在实际的选举投票中,选民会将其对政党的效用评价转化为投票选择。

为检验选民议题取向不同模型的解释力,拉比诺维茨与麦克唐纳伊提出两种方法:(1)单独使用议题立场来预测其对政党评价或投票选择的影响;(2)将议题立场放入包含年龄、省籍、政

党认同等社会心理学变量的完整模型中进行检验。^⑧ 接下来,我们将采用第一种方法对“趋近模型”与“方向模型”进行比较:通过0—10的光谱衡量选民与政党关于统“独”议题和社会福利议题的立场,其中,统“独”议题上0表示主张台湾应该尽快宣布“独立”,10表示主张两岸应该统一;针对社会福利议题,0表示主张政府维持目前社会福利,10表示希望政府积极推展社会福利,从而计算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效用差。因变量是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对象,以投给马英九、吴敦义者为“1”,投给蔡英文、苏嘉全者为“0”,至于投给其他候选人^⑨或回答其他选项者以缺失资料处理。因为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二元逻辑回归方法(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也就是说,假设因变量 $Y=1$ 的概率为 p ,则可以得到关于因变量 $Y=1$ 的分布函数为:

$$F(Y) = py(1-p)(1-y); Y = 0,1 \quad (1)$$

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p = 1/\{1 + \exp[-(a + bx)]\} \quad (2)$$

在进行两个模型的比较之前,我们先对两个议题的“空间长度”和“空间乘积”与其投票选择进行相关性检验。由于因变量——选民的投票对象为虚拟变量,因此我们采用“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表1 议题立场与投票选择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

政党	议题变量	投票选择
国民党	统“独”议题空间长度	0.571**
	社会福利议题空间长度	0.235**
	统“独”议题空间乘积	0.470**
	社会福利议题空间乘积	0.272**
民进党	统“独”议题空间长度	-0.370**
	社会福利议题空间长度	-0.132**
	统“独”议题空间乘积	-0.437**
	社会福利议题空间乘积	-0.169**

**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1显示出:选民与政党之间议题的“空间长度”和“空间乘积”与选民的投票选择之间都达到显著的相关性。对于国民党来说,二者呈现正相关,即当选民与国民党之间议题的“空间长度”和“空间乘积”越大,选民选择国民党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于民进党而言,二者之间是负相关的,即选民与民进党之间议题的“空间长度”和“空间乘积”越小,选民选择国民党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对选择民进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符合“趋近模型”与“方向模型”的主张:选民与政党之间议题立场越接近,该政党当选对于选民的效用也就越高,选民选择该政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对“趋近模型”与“方向模型”的解释力进行比较。

由于我们的模型中仅包含统“独”和社会福利两个议题,而实际影响选民政党效用评价的议题,绝对不限于这两个,且影响选民投票选择的因素,还可能包括选民的政党取向、候选人取向,以及其他个人社会背景属性等。因此,我们不能期待它们有很好的拟合水平,但可以借由“伪确

^⑧ G. Rabinowitz, S. E. Macdonald, “A Directional Theory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9, 83(1): p. 101.

^⑨ 投给宋楚瑜、林瑞雄者有38人,由于仅占2.1%的样本数,因此可以按缺失值处理。

定系数”(Cox&Snell R^2 和 Nagelkerke R^2) 探析:究竟是议题的“空间长度”还是“空间乘积”对选民的政党评价影响大,即台湾选民的“议题投票”行为究竟更符合“趋近模型”还是“方向模型”?

表 2 趋近模型与方向模型的二元逻辑回归结果表

	趋近模型			方向模型		
	B	Wald	Exp(B)	B	Wald	Exp(B)
两党效用差	0.471***	229.063	1.601	0.064***	137.597	1.066
常数项	0.520***			0.557***		
样本数	1 104			1 136		
-2LLR	1 024.958			1 263.759		
Cox & Snell R^2	0.350			0.217		
Nagelkerke R^2	0.471			0.293		
df	1			1		
预测正确率	79.1%			73.2%		

***表示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2 可以看出,两种模型的显著性水平都比较高,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达到了 0.001 水平上的显著。从伪确定系数来看,“趋近模型”的 $Cox\&SnellR^2=0.350$, $NagelkerkeR^2=0.471$, 分别大于“方向模型”的 $Cox\&SnellR^2(0.217)$ 和 $NagelkerkeR^2(0.293)$, 说明针对 2012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选民议题投票行为,“趋近模型”的解释力要比“方向模型”的解释力好。同时,从回归系数来看,“趋近模型”的回归系数为 0.471,比“方向模型”的回归系数(0.064)大得多,说明“趋近模型”中两党的效用差对选民投票选择概率的影响比“方向模型”中更大。总体而言,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议题取向更符合“趋近模型”,即台湾选民的议题立场比较具体,而不是简单的二分,在投票时台湾选民将更加关注自身立场与政党候选人立场的距离远近。

四、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趋势分析

通过前一部分的检验,我们了解到在 2012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民在统“独”和社会福利两项议题上的立场的确对其投票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那么,统“独”和社会福利两项议题在选民投票选择的过程中是否一直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它们的重要性是否会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呢?下面将把选民的统“独”议题和社会福利议题立场变量放入包含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省籍和政党认同等社会心理学变量的完整模型中,比较 2001—2012 年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变化趋势。主要解决的问题有:(1)统“独”和社会福利两项议题是否在历年的台湾领导人选举中都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了影响?影响程度是否发生了变化?(2)与其他可能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相比,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省籍和政党认同等,选民议题立场对其投票选择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一)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以 2001 年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2004 年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⑩2008 年台湾地区

^⑩ TEDS 研究项目从 2001 年开始,且 2001 年仅对当年“立法委员”选举展开调查;而 TEDS2004 年的领导人选举数据中并未涉及社会福利议题,遂以 2004 年“立法委员”选举数据代替。由于“立法委员”选举与领导人选举结果均可区分为国民党候选人与民进党候选人,因此均可作为考察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趋势的资料来源。

领导人选举和 2012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民投票对象为因变量,以投给国民党候选人者为“1”,投给民进党候选人者为“0”,投给其他党派候选人者或回答其他选项者以缺失资料处理。

2. 自变量

为了看出统“独”和社会福利两项议题分别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程度,我们将选民在两项议题上的立场分别设为自变量,仍以 0—10 的光谱进行衡量。

3. 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析选民议题立场对其投票选择影响的变化趋势,因此必须控制非议题因素对其投票选择的影响。根据社会心理学途径的认知及台湾研究学者广泛认为会对选民投票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省籍和政党认同为控制变量。

(二) 历年趋势分析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我们仍旧使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在进入具体模型的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先对所有的自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因为满足所有自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 0.8 的条件,故可将所有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表 3 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2001—2004

	2001				2004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Exp(B)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Exp(B)
性别(男=0)								
女	0.181	0.215	0.399	1.199	0.346	0.317	0.274	1.414
年龄	0.056	0.098	0.571	1.057	-0.077	0.156	0.621	0.926
教育程度	0.078	0.101	0.455	1.081	0.033	0.166	0.842	1.034
家庭收入	-0.020	0.040	0.606	0.980	-0.039	0.064	0.536	0.961
省籍(大陆各省=0)								
本省客家	0.923*	0.421	0.028	2.517	0.635	0.544	0.243	1.887
本省闽南	0.120	0.309	0.698	1.127	-0.217	0.412	0.598	0.805
政党认同(中立=0)								
泛蓝	1.938***	0.265	0.000	6.942	2.353***	0.411	0.000	10.513
泛绿	3.627***	0.300	0.000	37.614	4.322***	0.400	0.000	75.346
统“独”议题立场	0.066	0.048	0.167	1.068	0.249**	0.077	0.001	1.283
社会福利议题立场	-0.096	0.050	0.058	0.909	-0.084	0.054	0.116	0.919
常数项	-1.991**	0.723	0.006	0.137	-3.121**	0.954	0.001	0.044
样本数	643				435			
显著性	0.000				0.000			
-2LLR	571.605				283.869			
Cox & Snell R ²	0.387				0.503			
Nagelkerke R ²	0.517				0.679			
df	10				10			
预测正确率	80.4%				87.5%			

***表示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2008—2012

	2008				2012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Exp(B)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Exp(B)
性别(男=0)								
女	-0.133	0.257	0.604	0.875	-0.208	0.255	0.415	0.812
年龄	-0.069	0.128	0.591	0.933	0.080	0.122	0.513	1.083
教育程度	0.118	0.134	0.377	1.126	0.107	0.130	0.408	1.113
家庭收入	0.038	0.048	0.430	1.039	-0.051	0.050	0.301	0.950
省籍(大陆各省=0)								
本省客家	2.926**	0.962	0.002	18.645	2.796***	0.713	0.000	16.376
本省闽南	0.938*	0.404	0.020	2.556	0.109	0.372	0.769	1.116
政党认同(中立=0)								
泛蓝	3.405***	0.291	0.000	30.114	3.245***	0.322	0.000	25.650
泛绿	6.602***	0.492	0.000	736.637	6.678***	0.422	0.000	794.798
统“独”议题立场	0.369***	0.057	0.000	1.446	0.165**	0.062	0.007	1.179
社会福利议题立场	0.035	0.039	0.372	1.035	-0.084*	0.040	0.034	0.919
常数项	-4.758***	0.808	0.000	0.009	-3.629***	0.788	0.000	0.027
样本数	1077				1057			
显著性	0.000				0.000			
-2LLR	425.991				434.897			
Cox & Snell R ²	0.602				0.609			
Nagelkerke R ²	0.824				0.822			
df	10				10			
预测正确率	92.9%				91.3%			

***表示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和表 4 的检验结果表明,2001—2012 年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四个二元逻辑回归模型-2 倍的对数似然值(-2LLR)分别为 571.605、283.869、425.991、434.897,伪确定系数 NagelkerkeR² 分别为 0.517、0.679、0.824 和 0.822,说明四个模型所纳入的自变量(选民的社会背景属性、政党认同和议题立场)整体上对因变量(选民的投票选择)有较好的解释力,模型具有统计意义。接下来,我们就将利用上述检验结果分析选民的统“独”和社会福利议题立场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程度是否发生了变化。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除 2001 年以外,2004 年、2008 年和 2012 年台湾选民的统“独”议题立场均对其投票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且统“独”议题立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同时在 2008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回归系数达到了 0.369,为历年最高,说明在这三个年份的选举中,选民愈支持保留两岸未来统一的选项,投票给国民党候选人的可能性愈高。而就我们所知,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统“独”议题就已经走上台湾的政治舞台,在政党竞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为何在 2001 年的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中,选民的统“独”议题立场竟未产生显著影响呢?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1)政治形象取代统

“独”立场成为台湾选民关注焦点。20世纪末国民党统治后期,台湾地区“黑金政治”猖獗,官商勾结严重,贪污腐败盛行,这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使得民众对其信心降到历史最低。在2000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被贴上“黑金”代言人的标签,民众认为支持国民党就相当于支持“黑金”。求新求变的心态令许多选民转向了以“清廉”政治面貌亮相政坛的民进党。因此,就当时而言,大部分选民对于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区分多落在了两党“腐败”与“清廉”的政治形象差异上,而非统“独”立场上。这一影响从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一直延续到了2001年台湾地区“立法委员”的选举。(2)民进党通过模糊其统“独”色彩吸引更多选票。2001年上台不久的民进党经济表现并不佳,台湾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至-2.17%,创历史地点,而失业率也首次达到4.57%,创历史高点。^①而当时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已经愈来愈紧密,因此民进党当局也面临着来自民众和工商业界的巨大压力。据资料显示,2001年1月至10月,台湾民众在大陆实际投资额达23.98亿美元,相比上一年同期增加37.37%。^②对此,民进党采取了“一张一弛”的两岸政策,一方面仍旧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以延续其以往政策;另一方面,其口头上支持改善两岸关系,用温和“台独”掩盖了其激进“台独”的本质,迷惑了台湾选民。因此,相较于其他几年,2001年的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中统“独”议题并不凸显。而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统“独”议题立场对因变量——选民投票对象的解释力相较2001年、2004年及2012年要大,也与民进党当年的选战策略不无关系:2007年7月以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三度致函联合国以谋求国际空间,甚至在台湾发起了“入联公投”;而代表民进党参加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谢长廷的选战策略紧扣台湾意识,并将其操控成为台“独”意识,鼓吹两岸共同市场将会造成台湾产业空洞化的论调,试图借此达到“逆转胜”^③的目的。因此,统“独”议题成为选民评判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重要标准。

而对于社会福利议题,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001—2008年的台湾地区选举中,选民的社会福利议题立场均未对选民的投票选择造成显著影响,直到2012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社会福利议题才和统“独”议题一样发挥明显影响。原因之一是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竞选过程中虽然提出不同的两岸关系政策,但民进党为了获取选票,刻意保持其政策论述的模糊性。蔡英文在两岸议题上采取小心谨慎、迂回行事的做法,提出“台湾共识”,并声称“台湾共识”是开放性的,是对外谈判和内部整合的基础,甚至连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都可以包括在内。同时,有别于其过去一味反对ECFA的立场,蔡英文在《十年政纲》中主张以“强化台湾、凝聚台湾”为总目标,以“面向世界、公平正义”为“核心理念”,有条件赞成两岸经贸合作,极力营造其有能力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现状的假象,导致部分选民将注意力转移至与自身利益更为贴近的社会福利议题上来。

另一重要原因是台湾经济形势的低迷不振。2000年以前,由于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失业率,台湾地区的贫富差距也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受到2001年全球科技泡沫化的冲击,台湾经济增长率大幅跌落,由原先的6%以上跌至陈水扁执政期内的3.79%,^④马英九执政之后,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台湾经济增长率继续下跌,2012年跌至1.25%。^⑤经济的低迷带来

① 盛杏源:《经济与福利议题对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2008年总统选举的探索》,载于陈陆辉、游清鑫、黄纪:《2008年总统选举:论二次政党轮替之关键选举》,台北:五南出版社,2009年,第209—234页。

② 许世铨:《台湾“立委”及地方选举简析》,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20—23页。

③ 郑凤芬:《族群、认同与总统选举投票抉择》,选举研究,2009年16卷第2期,第23—49页。

④ 田慧琦:《台湾失业率与产出之关联及可能影响因素探讨——欧肯法则(Okun's Law)实证分析》,中央银行季刊,2010年32卷第3期,第29—65页。

⑤ 盛杏源:《议题、政党表现与选民的投票行为》,载于陈陆辉:《2012年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变迁与延续》,台北:五南出版社,2013年,第203—227页。

了失业率的增加,同时,贫富差距问题也更为凸显。从表 5 得知,2000 年以前台湾地区贫富差距五分位差一直维持在 5 倍以下的水准,2000 年以后由于经济不景气,贫富差距五分位差进入“6”时代,在陈水扁执政的第一任期内,五分位差为 6.18 倍,之后一直保持在 6 倍附近水平。然而,2009 年金融危机之后,五分位差陡升至 6.34 倍,之后稍有回降,也维持在了 6.2 倍左右。从十分位差和二十分位差来看,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则更为惊人,十分位差由 2000 年前的 20 倍以下增加至 2010 年的 32.81 倍;二十分位差则由 2000 年前的 32.74 倍陡增至 2010 年的 93.92 倍,相较 2008 年增加了近 20 倍。也就是说,2000—2009 年,台湾地区贫富差距虽然也有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但迈入 2009 年以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台湾贫富差距急剧恶化,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失业、减薪等问题导致他们收入大幅减少。另一方面,行政当局为了提升经济竞争力,于 2009 年修改台湾遗产及赠与税法,提高税额,导致原本避税资金回流台湾,在投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大幅增长,有房者资产增加,而大多数民众则购房负担加重,从而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

表 5 台湾地区贫富差距

	五分位差 ^a	十分位差 ^b	二十分位差 ^c
1981—1990 平均	4.60	—	—
1991—1997 平均	5.37	—	—
1998—2000 平均	5.52	19.21	32.74
2001—2004 平均	6.18	21.87	—
2005	6.04	23.50	55.13
2006	6.01	24.21	58.26
2007	5.98	25.27	60.37
2008	6.05	26.46	65.31
2009	6.34	28.13	75.08
2010	6.19	32.81	93.92
2011	6.17	—	—

说明:^a五分位差指最高 20%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除以最低 20%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b十分位差指最高 10%家庭的综合所得总额除以最低 10%家庭的综合所得总额。

^c二十分位差指最高 5%家庭的综合所得总额除以最低 5%家庭的综合所得总额。

资料来源:盛杏源《议题、政党表现与选民的投票行为》^⑩

在 2004 年和 2008 年选举中,民进党主打“爱台”VS“卖台”牌,冲淡了民众对两党在民生议题上有什么区别的认知。在 2012 年选举中,蔡英文极力将选举诉求往民生议题上拉动,以保证就业、社会住宅等政策诉求,辅用以“三只小猪”对抗“大野狼”的竞选策略,不过还是在“九二共识”问题上凸显了其政策短板以及与国民党的政策差异。为此,2012 年选民在统“独”和民生议题上的立场,同时对其投票行为产生影响,但统“独”议题更便于选民区隔不同政党的立场,进行符合自己政策的偏好。而在选民的认知中,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社会福利议题上立场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一旦有一个政党提出某一项福利或租税方案,另一政党立刻跟进,以免竞争政党独享功劳。^⑪因此,在 2012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民的社会福利议题立场虽对选民投票选择的影响已达到了统计上显著,但相关系数也仅为 -0.084,表示虽然选民越支持积极推展社会福利,投票选择国民党的可能性

^⑩ 同^⑤。

^⑪ 盛杏源:《经济与福利议题对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2008 年总统选举的探索》,载于陈陆辉、游清鑫、黄纪:《2008 年总统选举:论二次政党轮替之关键选举》,台北:五南出版社,2009 年,第 209—234 页。

越小,但影响程度并不大。不过由于台湾经济的不景气及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福利议题已经迈上政治舞台,成为影响选民投票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社会福利议题的重要性愈发显著。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提出“战略三策”,保证4年任内让基本工资调高到3万元台币,并推动富人税、缩小贫富差距,成为其政见的最大亮点。而相较以往,两岸政策的讨论则比较少,蔡英文更是极力将选举主轴定位为岛内的民生议题。

比较趋近模型与方向模型的解释力,可以看到在2012年选举中,“独”议题和社会福利议题的“空间长度”与“空间乘积”都与选民的投票选择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相关。而通过伪确定系数的比较,“趋近模型”的解释力要比“方向模型”大,即台湾选民的“议题投票”行为更符合“趋近模型”,即台湾选民的议题立场比较具体,而不是简单的二分,在投票时选民将更加关注自身立场与候选人立场的距离远近。

通过对2001—2012年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变化趋势的考察,我们发现:除2001年以外,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台湾选民的统“独”议题立场均对其投票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在2004年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和2008年及2012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选民愈反对“台独”,投票给国民党候选人的可能性愈高。而2001年统“独”议题的不显著主要是因为国民党“黑金”政治曝光,候选人政治形象取代统“独”立场成为台湾选民关注焦点;同时,由于经济表现不佳,民进党迫于民众和工商业界压力,暂时掩盖了其“台独”本质,模糊了其统“独”立场。在2001—2008年的台湾地区选举中,选民的社会福利议题立场未对其投票选择造成显著影响,直到2012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社会福利议题的影响才得以显现。除了国民党与民进党在两岸议题方面政策有所接近这一原因之外,近年来台湾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增加,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更是成为这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而在未来,随着选民和候选人愈来愈关注眼前,社会福利议题的重要性也会愈发显著,日益影响到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

Spatial Model of Issue Orientation Among Taiwanese Voters

LIN Gang, ZHANG Bin-q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issue of 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arty competition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a widening incom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aiwan provinc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distribu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During the 2012 elections, the issue of social justice and inequality became one of the acutely debated issues between the ruling Kuomintang (KMT) and the oppositio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hich issue, social welfare or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options, is more important for Taiwanese vote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voting behavior of Taiwanese and their issue orientations in the abovementioned two subjects via two models of spatial theories by employing the TEDS2012 data. It has reached a conclusion that different issues have various impacts on voting behavior of Taiwanese voter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issue orientation;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social welfare; spatial model

(责任编辑 尧 木)